

第一编

问题的提出

一 百年美学：学术史的追寻

——研究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几个问题

（一）学术史研究的可能性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迄今已有百年的学术积累历史。如果我们从学科形态的改变方式来看的话，古典中国美学的那种直觉体验或艺术感悟性质的“发散性”理论话语，在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历程中，以一种相对自觉的方式，逐步转向了对于思想的体系化、理论的逻辑性和方法的科学性的现代追求。可以认为，这种学科形态上的逐步转换，一方面确实产生并规范了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活动的新的内容，使得百年来的中国美学在自身学术增长过程中形成了更大的思想包容性；另一方面，它也使 20 世纪中国美学理论从具体观念到整体思维形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得以不断尝试从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等方面进行各式各样的学术建构。

而如果我们从更具体的方面来讲，那么，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积累过程本身，其实又包含有多个层面的形式。这其中，既有以一种“拿来主义”、“对外开放”姿态引进、吸收外来（主要是西方）美学思想的理论准备活动，以及对于各种本土传统美学思想（包括传统的艺术经验和理论观念）所作的学

科规范化的重新阐释；同时，许多具有现代创意性质的理论探索，也常常在这一百年的学术进程中呈现出自身独异的风采——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最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美学学术活动中，形形色色的理论求新、求变努力变得益发鲜明，仿佛是百年美学开始了一场最后的“世纪冲刺”。

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学术发展的意义上，20世纪中国美学确乎表现了一种特有的价值，而对于它的探讨，也将可以从两个方面给予我们非常有益的帮助：其一是对于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过程能够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从中发现20世纪中国美学在自身理论道路上的基本精神；其二是反思性地寻求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特性和规律，在对于历史的深入思考过程中获得新思想的创造性根据，构造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前景。

不过，从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有研究状况来看^①，有一个现象显得相当普遍，即：绝大多数学者的工作，基本上还

这方面已经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封孝伦的《20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邹华的《和谐与崇高的历史转换——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聂振斌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邓牛顿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姚全兴的《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述评》（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张涵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辽、王臻中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思想概观》（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赵士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阎国忠的《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保持在一种“美学理论史”的逻辑叙述层面上，其重点或者是讨论美学的各种具体理论概念、命题以及理论方法等的自我独善的逻辑演化进程和相互联系，或者是对历史上的一些个别美学家的美学理论建树作出总结和评论。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在 20 世纪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上设置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线性的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其在尽力复现理论的原有表现样态之际，却又往往遮蔽了纯粹美学逻辑之外的各种思想文化进程的存在意义——在一般理论史的逻辑叙述框架中，美学概念、命题以及美学家的个人工作总是占有不可替代的主要地位，对美学理论本身逻辑关系的不断演绎，已经从历史的进程上驱逐了各种复杂的、难以用逻辑形式去描述的外部思想关系的存在，同时也无须重新考虑一种美学理论形态的学术生成机制。于是，一般理论史的叙述常常可以是非常简练而条理化的。任何一种理论概念、命题几乎都可能在这个纯净的叙述体系里找到它自己的确定位置。然而，倘若我们想对问题作更深入一步的把握，即试图从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思想和文化进程上，来讨论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积累过程及其学术意义，那么，仅仅凭借这种理论史的逻辑叙述方式便显然是有困难的。因为很明显的一点是，作为一种既定的历史存在形态的 20 世纪中国美学进程，不可能仅仅以其逻辑必然的形式超然于整个世纪的思想文化意识之上；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生成与展开，总是以一定思想的潜在关系而同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复杂生存形态保持着特殊的联系。换句话说，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发展过程，既与其理论的逻辑演化有一致性，同时它又具有比一般理论史形式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体现了更为广泛的思想建构性质。因此，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美学，我们不仅

要关注其理论的逻辑演化，更要看到在其历史发展中，影响美学理论的学术价值的各种具体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也许，在探讨美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真实发展的过程中，一般理论史的叙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必须重视的、具有史料学意义的研究方式和结论；而要想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有更充分的理解，特别是，要想从它的思想历程中获取对于百年美学学术发展性质的反思性把握，我们还应当更全面地进入到整个 20 世纪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历史真实中，在一种整体联系性中考察包括理论演化在内的美学学术活动——这正是—般美学理论史研究与强调“思想整体性”和“文化联系性”的美学学术史研究之间的不同旨趣。

（二）学术史的着眼点

对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史研究课题来说，各种具体的美学概念、命题以及美学观念等的内在关系和逻辑深度，包括重要美学家的个人工作，必须被认真讨论并得到具体的阐释，以便我们能够对整个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演进过程同 20 世纪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想文化运动之间关系的理论表现方式，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也就是说，美学的学术史研究是可以而且应该包容着一般理论史工作的。所不同的是，对于美学的学术史研究来说，要想把问题往更大的方面、更深的层面去进行思考，就必须对提出问题的方式和问题的存在性质进行再探讨；也就是说，纳入学术史探究范围的各种美学理论关系、演化逻辑，不是作为一些孤立的文本，而是作为学术史考察的具体出发点来提出的。其结果不在于形成某种美学的历史知识

而是发掘美学历史深处的学术价值构造。因此，美学的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着眼点，在我们看来，主要应该是：

1. 各种重要美学学术话题的提出与深入，以及相应理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与整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运动之间的具体联系及联系方式；进而在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社会发生学意义上，进行两个方面的确定——确定美学学术演进的文化契机和发展机制，确定美学历史建构的宏观思想模式，造就美学学术史研究的文化视野。

必须承认，着眼于此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从某种学术积累的有机整体中，来理解美学活动的历史根据。一方面，确认历史过程中的美学之作为一种特定价值话语，是如何可能把时代的精神理想和文化目标转换为自身学术发生前提的；另一方面，确认美学理论所体现的历史客观性和具体性。比如，对于一个时代的美学活动（包括理论热点的形成、学术论争的发生方式、学术思想中心的出现等等）以及美学范畴的性质、美学观念的演变过程的考察，只有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变动所带来的文化氛围，以及大众审美方式、审美趣味变异所形成的社会审美意识这样一些宏观历史条件来着手分析，才能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对美学的学术积累过程形成深刻认识，并透过美学的知识性层面来把握其学术发展的规律。

2. 美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哲学、艺术学、文学理论、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的学术研究活动之间发生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包括不同学科间在理论资源、研究结构、学术形态等方面发生具体交流的过程、形式和结果，以及在建构一个代的整体学术景观方面，美学同这些学科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性质；从而在美学与整个时代的学术发展过程之间建立起一种

必要的联系，既将各种具体美学活动的学术资源问题纳入整个学术史的研究对象之中，以把握美学历史形成中的客观学术前提，又从一个时代的整体学术发展方面来考察美学的学科建设特性，充分理解美学“何以如此”的知识性根据，在美学历史存在状态中找出其学术进程的时代意义。

这里，从什么样的角度和思想层面，来对一个时代的学术活动规律、学术发生和展开的形式、学术思想的历史互动及其价值等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显然是我们在进行学术史研究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角度和层面的不同与更迭，势必导致对美学的学术前提和知识性根据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把握方式，并进而影响到我们对于美学历史中各种学术关系的把握。

3. 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话语之间的交流和冲突，是影响美学的学术展开，从而不断深化或改变美学的思想形式、理论方向甚至学科建构性质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也是我们在寻求美学学术变异的深层动机、把握美学发展的内在学术机制时，所必须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

尤其是，作为一种对于学术经验和历史过程的整体把握形式，美学的学术史研究只有深入到这种不同文化的学术话语交流与冲突的特殊文化性质层面，才有可能从一个时代的美学学术积累的各种具体成果中，有效地把握其所反映的思想的本质特征，以及美学学术活动的真正历史价值。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美学的学术史研究与一般理论史叙述之间存在很大区别的地方，在于一般理论史的叙述也可能有意识地探讨诸如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学术活动的渗透、中国学者对异域美学理论的研究成就等一些具体问题。但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由于出发点、讨论形式和思考的层面并不相

同，因此，同一个问题在学术史的和一般理论史的探讨中，就完全可以产生出不同性质的理解。更何况，美学的学术史研究不仅关心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话语之间交流、冲突的具体理论表现，还特别强调考察它们在历史变动中的实际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对于新的美学理论命题的提出方式、学术观念的历史表达方式、理论思维的实际转换方式等所构成的深层影响效应。这样，在美学的学术史研究中，我们其实既依据了特定时代美学理论的成果形式，又在不同文化的学术话语交流与冲突层面，超越了既有理论形式的有限性，能够看到以一般理论史叙述方式所无法见出的美学发生、转换的文化整合特性。

4. 美学家群体在知识结构、文化意识乃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实际存在状况，应该说是美学学术活动中的主体制约因素，它对于美学研究的深化、美学思维的形成与转化、美学的意识形态特性，尤其是对于美学的学术认知形式——内化在研究主体理论观念中的特定学术建构目标和价值立场，是一种潜在地规定了主体理论意识指向的深层根据，也是决定整个理论逻辑图形的思想前提。

当然，作为美学的学术史研究，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而在于我们如何可能从美学学术活动的持续性展开过程中，把这一方面的讨论引入整个学术史性质的确定之中；在于我们何以能够从美学学术活动的主体形式来界定整个学术进程的历史客观性。应该说，通过对于这一着眼点的具体把握，我们可以更加确切地了解美学进程本身的知识含量及其对学术积累过程的具体影响，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主体存在的历史意义。

在我们看来，上述四方面着眼点的提出，其根本的目标，

是要全面地揭示美学历史形成过程的思想持续性特征和意义，将美学史的研究形态从单纯的理论逻辑演绎层面，引入对于学术发生、演化活动的整体性考察，把握美学理论、美学观念及各种美学问题的学术建构方式和历史——文化规定性，理解美学历史变动的深层文化蕴涵，进而在学术史范围内“重构”美学发展的历史价值。这样，在有关美学的学术史探讨中，我们所获得的，将是一种生成于宏观思想文化进程中的美学——它不限于某种理论命题、理论观念和方法本身的自我独善的逻辑行程，而是集中关注了美学学术积累过程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思想线索和文化命运，集中思考了一个时代的美学活动的学术价值。

同一般理论史叙述形式相比较，美学的学术史研究显然更加突出了美学理论发展的文化和思想意义。也因此，如何从复杂浩繁的理论材料中发现那些直接体现了整个时代的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精神的学术追求；如何从理论推演上升到思想意义的把握；如何从整个时代的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客观事件中把握美学问题生成与深化的精神实质，便是我们确定美学学术史研究形态时所必须注意到的几个难点问题。就拿 20 世纪的中国美学来说，当我们以一种学术史的探讨方式来思考其中的问题提出方式时，很显然，我们既无法完全绕过对于 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某种细微性特征的认识，也不可能有意地回避掉对于整个百年里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事实上，整个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变动特性及其意识形态本质，正是我们思考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规律、特性的具体内容之一。比如，对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论争问题的探讨，显然就必须看美学论争发生的基本的社会意识

形态动机及其转换过程，以便能够从中看出美学论争形成、展开的学术前提。无论是对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以及其中关于美的主客观性问题的辩论，还是对于 80 年代改革开放条件下出现的“主体性”问题的激烈争执，或是对于 90 年代的“当代中国美学转型”问题的研究，包括“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对立、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等等；很显然，学术史的探讨视线，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游离于 1949 年以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换问题之外的。

如果说，一般理论史研究致力于美学自身理论逻辑的重新整理，那么，学术史研究则要求呈现出美学在客观历史进程中的整体学术形象，以历史的阐释方式来领会美学的价值论图景，并以此反观一定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特殊面貌。

（三）关注百年

从上述着眼点出发，我们认为，对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史研究，重点需要探讨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历程上，美学领域的各种学术探讨活动，无疑是十分引人瞩目的——在一定意义上，美学的学术活动不仅仅是“美学的”，而且也充分映照出整个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面貌。从 30 年代开始，一直到 90 年代，除去那个学术研究普遍荒芜并被残酷的现实政治斗争所取代的十年“文革”时期以外，研究话题相对集中的美学讨论曾经发生过许多次。如关于“美的本质”和“美的规律”问题的讨论，关于“美学方法论”的讨论；关于“美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关于“中国美学的特征”讨论；关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

讨论，以及关于“当代审美文化”问题的讨论，等等。许多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相当有成就的学者纷纷介入其中，提出了各自对于美学问题的看法或理论观点，甚而在讨论中构成了具有一定理论体系的美学学派，如“实践派”、“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及“审美关系派”，等等。这一切，都足以表明，美学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确有其自身特殊的意义和地位。

那么，从学术建设的整体过程来看，20 世纪中国美学的这种学术“意义”、“地位”到底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以怎样的方式和怎样的形态——具体体现在 20 世纪中国美学理论中的？或者说，美学为什么能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成为一门显赫的学科？显然，这个问题如果只是从美学自身的理论逻辑层面来进行演绎，是很难真正得出令人满意的深刻结论的——这也正是我们从诸多相关著作中无法看出 20 世纪中国美学特定学术史价值的确定判断的原因所在。

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来说，尽管 20 世纪中国美学在学术建设上的特殊“意义”、“地位”有着多方面的成因，并且人们对此也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诠释过程。但是，在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的，即：在整个 20 世纪的百年学术道路上，中国的美学和美学研究始终就没有“纯粹”过。20 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关注方向、美学理论的生成与展开、美学热情的高涨与低落，总是同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转换进程、意识形态的变动保持着密切联系，呈现出特有的思想风采：面对衰微国势，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现代性实践，决定了自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新美学便总是试图把美学放在一个社会伦理实践的“进步”范畴之中，在对旧社会、

旧理论的批判的否定方向上，借助“美”的纯洁崇高的人性价值规范的建构，来标举社会进步的理想之途（如梁启超、蔡元培）；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苏俄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想、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模式等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和争执，既是中国美学界对反映论和价值论两种美学采取截然不同立场的具体意识形态背景，同时又对美学怎样才能反映时代精神、造就社会“新人”这一理论功能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思想要求（如周扬、蔡仪和朱光潜）；而 50 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实践与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则一方面为发端于“批判资产阶级美学”的“美学大讨论”确立了基本的意识形态前提，另一方面，又为以后的中国美学发展规定了一种极其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式，由此，各种美学流派的形成与理论分化过程，便不能不内化了一定的意识形态运动要求和特点，进而也在中国美学学术进程上强化了各种现实利益的相互矛盾和制约性，突出了美学理论转换的现实动机。及至 80 年代，在“解放思想”这一社会政治运动和“人道主义”、人性解放的文化呼吁面前，诸如“实践论”美学等理论体系则获得了自身不断深化的客观前提，围绕人性发展和文化建构的诸多话题，逐渐形成了 20 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美学新的学术景观。依此而言，在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中，美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占有显赫地位，同它在理论上始终保持了与现实思想文化运动的具体关系是密切相关的。正因此，在学术史范围内来把握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意义”“地位”便应当同样深入到整个 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内部之中：“体现了什么”和“如何体现”问题，具有超出一般美学逻辑之上的性质。

2. 美学的学术演进过程与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关系。

这里，问题的核心，在于要从 20 世纪中国美学既有的历史形式中，找到其学术展开的深层关系结构及其理论发生机制，为从整体上揭示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价值构造提供具体而明晰的依据。为此，我们有必要注意两点：

第一，从总体上看，20 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体现了一种非常鲜明的、极具时代特征的文化建设理想和追求，即致力于通过学术方式来践行全社会的思想启蒙任务，实现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为现代中国设计民族振兴、文化进步、生活幸福的理想发展模式。这是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活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也是其具体实践自己的学术追求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因此，包括美学在内，20 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一致方向，便是力图把那种现实与理想、困厄与超越的矛盾及克服矛盾的强烈意愿，深深地融入形形色色的理论努力之中，由此既影响了人文学术工作本身的存在形态，又制约了各种理论的具体学术表现形式。我们探讨 20 世纪的中国美学，无疑应从这一方向上去求取有关历史客观性的具体把握，理解美学历史的精神脉动。

第二，从整个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状况来看，美学在其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不是去说明美学的学科特性，而在于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美学在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可能存在的学术影响力，揭明美学的学术进程对于建构 20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这一点，较之讨论其他学科对美学活动的影响，常常是更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当人们考虑诸如哲学、文学或艺术史等对美学理论话语

的渗透形式时，往往很少去深思美学活动对于其自身之外各种理论深化过程的意义。而事实上，如果美学活动仅仅是其他学科学术话语的单方面受益者，我们便很难设想，20世纪中国美学还有什么自己的“学术史”可言。比如，当我们思考80年代的文学理论时，是不是经常能够从中寻觅到某种同美学的具体关联呢？又比如，“主体性”除了是一个哲学性的话题以外，它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是不是与“实践美学”的固有旨趣有着更为直接而显著的联系？再比如，美学本身提出问题的过程及其讨论、追问问题的方式，对于建构20世纪中国人文学学术话语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如何影响的？这些问题显然都有赖于我们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去予以总体的回答了。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20世纪中国美学同整个20世纪中国人文学学术发展相与共，那么，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西方学说及其理论观念、方法等的引进、接纳和消化问题，就不能不被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里，需要提出讨论的主要课题，不是20世纪中国美学接纳了西方美学，而是它“如何接纳”了西方美学？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已经成为客观历史事件的对象（问题），美学的学术史研究所注重的，是它在产生和展开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共时性的东西，以及这些共时性方面在历时性过程中的存在本质。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而言，西方美学理论、学说及方法等的引进与吸收，不仅有力地改变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具体学术存在形态，而且，它在更深的层面上，使得中国美学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新的思想材料，确立了20世纪中国美学走向现代理论之路的思维构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中国美学的演进，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具体形式上，它是一次又

一次的引进、介绍与应用工作；在总的精神本质上，则反映了 20 世纪中国美学吸收与借重异邦学术思想、学术规范的必然性。因此，面对这个 20 世纪中国美学历史中的重要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去问究：首先，接纳西方美学的中国学术语境（特别是中国美学的历史资源和时代境遇）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一点，关系到中国美学家具体理解、应用西方学术话语的可能性和差异性？其次，在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学术语境中，西方美学从具体概念到基本方法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异？其变异过程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是什么？这种变异之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积累的根本影响又是什么？实际上，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力量，无论古典、近代或现代的西方美学，它们之能在 20 世纪中国出现并产生某种具体的学术影响，除了有其自身价值和理论必然性起作用以外，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来决定的。就像有了 80 年代全中国社会高涨的人性呼吁，始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美学和心理学美学的大规模引入，西方学术话语在中国美学学术积累中的存在根据，正在于引入和保存其具体形式的中国人文学学术语境本身的趋势和特点。正因为这样，在 20 世纪中国美学进程上，西方美学理论的每一特定变异便总是呈现出某些特殊的“中国语境”的意义。而把这个问题纳入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史的研究范围，就是力图从西方美学的变异景观中，发现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自身精神取向、内化外来思想的学术依据及能力，由此把具体理论的演化同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发展的真实性质联系起来，加以进一步的考察。

3. 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史的讨论，必定涉及到如何重新认识和确定近代以来中国美学自身历史结构这一问题。

这里，一方面，我们要以一种整体的文化考察立场来认真看待中国美学在 20 世纪的演进程序，既不是将之依照某个机械的线形“时间表”而肢解为近代、现代和当代等段落，使美学的历史完全成为一种“时间的片段”，或一个又一个片段的线性连缀（这已经是我们许多美学史研究者非常拿手的套路了）；又非单纯理解为一套合乎某种逻辑体系要求的理论概念、命题的排列组合，从而令美学的历史变成诸多概念、命题的整理和堆砌。学术史研究需要的，是我们能够从 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实际进程上，来寻找美学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发现美学活动的总体规律，以便美学的历史同时能够映照百年中国文化的精神变动，揭示出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相关性的思想的历史存在图景（从这一点来讲，即便是我们当前所从事的美学研究本身，显然也有必要放回到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整体学术运动中，才能显示出它在历史结构中的存在特性）。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学术史探讨的重点，又在于把握美学理论演进中的主要历史结构规律、结构性质及结构的方式，因而，需要强调的是某种学术思想本身的结构连续性，而不是历史的时间构架——美学理论的逻辑完整性必须首先体现出思想的有机延续，以及延续过程的思想进化价值。更何况，对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来说，其历史过程的客观性虽然是既定的，但理论的具体结构活动又存在种种或然性，这样，在历史结构的客观性与或然性之间，便存在某种需要我们去揭示的规律、性质和方式。这些对于那种纯粹以理论逻辑为目标的一般美学史叙述来说，当是无法全面了然的，而需要学术史研究来逐步予以澄清了。

（王德胜）